

新中国成立以来日常生活的变迁及 日常生活伦理构建面临的难题

鲁 芳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带来日常生活的变迁。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基层生产单位组织化及其与生活单位的高度重合使日常生活呈现整体性,阶级斗争思维曾使日常生活呈现过度政治化的特点。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确立使日常生活中的功利性诉求逐渐增强,改革对个体活力的激发使人的个体性开始抬头。21世纪以来,日常生活结构的整体性瓦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们在形式上的个体化生存成为可能,日常生活的个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在这一过程中,日趋个体化的日常生活组织结构与社会主义道德的日常生活基础之间形成了张力,不均衡发展的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统一性要求的矛盾,以及日常生活伦理观念的多样性与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价值导向的矛盾,都给我国当前的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带来难题。

关键词: 新中国; 日常生活; 变迁; 伦理构建

作者简介: 鲁 芳,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04)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变革各种制度,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因此发生重大调整;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又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些变化无不在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泛起涟漪,带来日常生活的变迁,同时也给日常生活的伦理构建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日常生活整体性的构建与政治化的增强

新中国成立之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尚未形成,国内外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积极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一段时期的重要指导和基本方针。日常生活总体上呈现出整体性和政治化的特点,表现为:日常生活的组织化特征较为明显,政治思维、政治逻辑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

(一) 基层生产单位组织化及其与生活单位的高度重合使日常生活呈现整体性特点

日常生活的整体性是指,个体的日常生活因为某种特殊的纽带联结而具有了组织性,彼此渗入、融合程度较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一套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将社会成员纳入组织之中进行集中管理。这一组织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在城镇是“单位”;它们既是生产资料的提供者,也是生活资料的提供者,既是生产单位,也是生活单位。统一生产和统一供给成为将个体的日常生活联结为整体的特殊纽带。

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促进了基层组织结构的整体化。1953年,毛泽东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1]1956年社会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日常生活的变革与伦理构建研究”(16BZX106)

改造的基本完成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了确立,而且意味着城乡基层生产单位实现了向组织化的过渡。尔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蓬勃展开。截至1958年10月底,全国99%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这一时期,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建立以相应的公有制组织的建立为基础。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都处于特定的“公有制组织”之中,个人是公有制组织中的一员。

基层组织结构的整体化决定了日常生活组织结构的整体化。生产组织同时也是生活组织。生活资料由组织按计划统一供给,人们基本上以组织为单位构成一个个日常生活圈。在城市,“单位”是生活场所的提供者,人们以单位作为日常生活场所。在农村,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农村集体组织并未打破传统的宗法血缘家庭组织,相反,集体组织就是若干宗法血缘家庭的集合。这种天然村落(血缘家庭)是自古以来农业文明社会中的基本组织结构,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活动范围,也常常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活动单位。“它们或作为生活系带,或作为文化的空间簇,或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组成乡村社会的系统。”^[2]因此,从日常生活组织结构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人们都处于组织化的整体构架之中,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熟人生活圈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

日常生活组织结构的整体化使个体的日常生活通常以“组织”为纽带联结为一个整体,日常生活呈现较高的组织性。在整体化的社会基层组织中,人们共同生产、共同劳动、共同饮食(公共食堂),拥有共同的日常生活交往圈。“组织”不仅组织生产,而且组织日常生活,它常常是诸多日常活动(如节日庆祝活动、日常休闲活动和娱乐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承担着丰富人们日常生活的职能。组织内人们的日常生活相互嵌入的程度较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较多的沟通、交流以及相互交涉。日常生活中相互照应、相互交往,互通有无。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矛盾的时候,“组织”常常成为裁判员和调停者。

综上,整体化的日常生活具有如下特点:组织架构的整体化、交往圈子的熟人化、日常生活的交互性。而且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及组织对生活资源的调控,城乡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都受到了有效管理,日常生活又具有了固定化的特点。

(二) 阶级斗争思维使日常生活呈现过度政治化的特点

在阶级社会,人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生活的政治化在所难免。就日常生活而言,它不仅是一个“自在的”领域,是个体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场所,也是意识形态的寓所,是政治必然向其中渗入的重要领域;生活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除了闲话家常也常常议论政治,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治理念融入到日常观念之中。日常生活与政治难以割离,日常生活的政治化难以避免。然而,“我们应该享有的可能既不是过度政治化的日常生活,也不是彻底世俗化的日常生活,而是适度政治化的日常生活”^[2]。那么,适度政治化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我以为,适度政治化应当是政治理念融于日常生活逻辑之中而不显刻意和生硬,日常生活依然保持其应有的从容和平静,依然保持着日常生活的常态。过度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则使政治运动、政治斗争充斥于日常生活之中,使日常生活充满了政治的紧张,日常生活脱离了常态的轨道^①。

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一定范围内尚存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并且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日常生活已经过度政治化。具体表现为:首先,日常活动的过度政治化。一方面,政治运动成为人们的日常活动;另一方面,某些正常的日常活动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其次,日常人际关系的过度政治化。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阶级标准成为选择日常交往对象的重要标准,“出身”不好、“成分”不好的人在日常交往中常常处于劣势,受人排挤或者孤立。再次,日常文化活动的过度政治化。一段时期,政治题材的作品几乎垄断文化领域。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保持了高度纯洁,一大批坚持正确价值引领的文艺精品创作出来,但是人们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参差不齐的精神觉悟被忽略,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也受到极大影响。

(三) 日常生活的整体性、政治化反映在日常观念领域就是整体思维和政治思维的痕迹显著

日常生活结构的组织化强化了人的“组织感”和整体感,人们相应地形成了整体思维,义务感、奉献意识较为强烈,而基于个体性的自由、权利意识较为淡薄,人们普遍崇奉的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高尚的价值追求。这种整体思维以及与之对应的价值理念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对家庭的责任感强烈,因此离婚率低,日常生活的基本组织结构稳定。另一方面表现为日常生活边界意识淡薄,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生活缺乏严格的界限,人们习惯于直接介入、干涉他人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的过度政治化强化了人们的政治思维、阶级斗争思维。政治话语大量涌入日常语言,阶级标准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重要标准,左右着人们的日常行为选择。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和政治化为社会主义道德及价值观念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日常生活基础,在此基础上,政治、文化、经济与道德实现了步调一致的互动,使道德生活具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实现了国家价值导向与人们价值取向的高度一致。

二、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日常生活功利性诉求的增强与个体性的抬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经济话语的空间得到快速拓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权利、利益成为人们的重要关切,并逐渐成为影响人们价值评价的重要因素。社会的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原来封闭、单调的日常生活,人的个体性逐渐增强。但是,经济领域的变革尚未动摇日常生活组织结构整体化的根基。日常生活正处于过渡期、转折期,因此也是日常生活价值观念的冲撞期。

(一) 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确立使日常生活中的功利性诉求逐渐增强

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订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目标的设定,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需要满足的合理性,改变了人们“耻于谈利”的价值观念。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以及非公经济的发展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尝试,为人们提供了追求物质财富的机会,刺激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望,下海、炒股、外出打工成为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选择。20 世纪 90 年代的系列改革打破了原本稳定的利益格局,物质利益的不稳定性更加刺激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人们的功利性诉求日渐增强,义与利的天平开始向“利”的一方倾斜。日常生活的经济标准逐渐成为显性标准。

日常物质消费超越了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工具价值,成为衡量其他事物的价值标准,成为目的本身。首先,日常物质消费在价值序列中的地位攀升,成为涵括其他重要价值的终极价值。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带来日常物质消费的“跳跃式”增长;收入差距的拉大带来日常物质消费水平的参差不齐。人们的价值观遭遇巨大冲击,人们对幸福、能力的理解开始掺杂更多的物质考量。富裕程度、金钱多少成为一些人评价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金钱、商品在使用价值的属性之外,获得了某种社会价值的属性,成为能力、地位、幸福的象征。金钱在价值坐标体系中地位的提升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日常消费观,人们对物质的欲望开始膨胀,金钱的多少必须且可以通过消费对象的品质、品牌、价格得到反映,于是,通过消费、占有具有特殊价值象征的商品(物)就成为新的消费潮流和消费趋势。日常物质消费由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工具手段变为了彰显人的价值的目的本身。

日常交往中的物质交换原则、金钱评价标准日益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加速、市场的逐步开放打破了以往的国家单一利益主体格局,各种生产单位都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虽然没有打破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却使家庭摆脱了农村公社大集体,成为经济上独立核算的利益主体,家庭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得到强化。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使国企作为独立利益主体面对市场,其内部职工之间因新的利益分配而产生利益的竞争。利益关系成为市场主体的基本关系,利益的考量和计算成为理所当然的“常识”。这一常识反映在日常交往中表现为物质、利益交换,情义无价变成了情义有价,关系的亲疏、情义的深浅似乎都可以用金钱衡量,日常生活中的礼尚往来越来越夹杂功利的痕迹。

(二) 改革对个体活力的激发使人的个体意识开始抬头

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在生产关系还是在日常生活结构中,个体都未能从组织中抽离和凸显出来,人的个体性受到压抑,个性难以施展,日常生活高度同质化。从服装的颜色、款式到文艺作品的题材、内容,都强调整齐划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将个人与组织作了一定的剥离,强化了个体的责任,直接触及到个人利益,使人的个体性得到重视和彰显。另一方面,理论的创新、思想的创新、制度的创新都在努力调动个体的积极性,激发个体的活力,人们长期被压抑的个体性需求获得了释放的机会,自由、多样、个性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越来越普遍而深入的体现。

在穿着打扮上开始打破传统,突破常规,张扬个性。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男青年留长发、爆炸头发型,

戴蛤蟆镜、穿牛仔裤、喇叭裤、手持卡式录音机、跳迪斯科,以此来表达内心对不羁、自由的追求。文化领域的一元化逐渐被多样化取代,流行音乐、摇滚乐兴起,霹雳舞、迪斯科开始流行,歌星、影星逐渐成为政治偶像、英雄人物之外的崇拜对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新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以反思色彩应和了人们对人性问题的讨论,反映了人们个体意识的抬头。

个体意识的抬头还表现为人们对自身价值、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和理性审视。从“文革”中走来,高大全的理想和善良的道德信条被残酷的现实碾磨,原有的人生观遭遇怀疑;改革开放向人们展示了新的世界,新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下,人们亟须进行价值重塑。在破旧立新的转折时期,极易出现道德困惑、价值迷茫。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载了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表达了自己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困惑和迷茫。1982年7月大学生张华救老农牺牲的事迹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价值如何衡量”的大讨论,反映了价值观领域出现的裂变。基于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跳出了体制的束缚,怀揣梦想,远走他乡,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开启追寻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之旅。

个体意识的抬头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为人们追求人生价值实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日常生活由此改变了单一的模式,更加丰富多彩。然而,个体意识总是对抗着统一性,个体意识的抬头造成了对统一价值认同的冲击,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冲突日渐增多。

(三) 日常观念领域中功利主义滋生和自由权利意识增强

与改革开放前人们惯用的政治话语不同,这一时期,出身、成分、口号等带有明显阶级政治色彩的观念逐渐淡出日常生活,经济话语渗入日常生活,催生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流行语——脱贫致富、停薪留职、下海、下岗、炒股……经济利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关切和价值追求,以至于出现了“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才图”的俗语;有人将金钱搬上神坛,有人陷入物质享乐的泥潭。80年代电视开始在家庭普及,电视广告散播的物质诱惑、电视节目展现的奢靡生活令一些人难以抗拒、憧憬无限。日常生活充溢着物质欲望和物质追求。“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受到“义利两顾”甚至是“重利轻义”的冲击。人们不再耻于谈利,一方面,人们开始追求正当个人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对利益(物质财富)的占有成为一些人炫耀的资本,一段时间内炫富之风盛行。

与改革开放以前整体性的日常生活结构下人们对义务、责任的重视和担当不同,改革开放以后个体意识的抬头带来的是人的自由权利意识的增强。婚姻家庭领域,人们更注重自身的感受,强调自身追求幸福的权利,离婚率逐渐走高;亲子关系中,子女的自由权利得到重视,父母更加尊重子女的意愿和选择。日常生活的边界意识开始形成,但由于住房商品化尚未全面实施,居住形式上的整体化尚未打破,因此边界意识尚不明显。

这一时期,功利性诉求的增强对主流价值观造成冲击,个体意识的抬头在为社会创造活力的同时,也使价值观领域的分化成为可能。因此就日常生活的伦理构建而言,丰富性、多样性给统一性带来阻碍,社会的价值导向与日常生活主体的价值取向开始呈现更多的不一致;社会活力的增强增加了日常生活的变动性,同时使其稳定性受到影响,日常生活的伦理构建需要在不断的变化中寻求稳定性。

三、21世纪以来:日常生活的个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功利化也是21世纪以来日常生活的重要特征,而且由于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功利化的程度相较于前一阶段更为凸显,其负面效应也正在逐渐显现。然而总体而言,日常生活的个体化更能体现21世纪日常生活的特殊性。对应于日常生活“整体化”的“个体化”,强调的是人存在的独立性,即人的独立存在和运动作为个体存在的表征越来越得到凸显^[4]。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逐渐走入千家万户,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使公共日常活动变为私人活动,日常文化消费趋于私人化^[5]。日常生活的个体化趋势已经形成。21世纪以来,经济关系领域改革的深化使日常生活结构的整体化格局正在全面瓦解,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使日常生活的个体化又获得了新的呈现形式。

(一) 日常生活结构的整体性被瓦解,个体化特征明显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日常生活整体性根基逐渐被瓦解的过程,这一过程在21世纪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化得到进一步加速。日常生活消费(尤其是住房等大宗消费)的全面商品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都在客观上弱化了个人与单位、土地、血缘家庭之间的关系,强化了作为独立个体的公民身份。

“所谓个人消费的全面商品化,概括地说就是全社会的劳动者直接用于个人维持和发展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全部由个人的货币收入来支付,包括消费的物质文化生活资料和接受的劳务服务费用。”^[6]住房商品化在20世纪末开始推行,21世纪全面实行,货币分房取代了实物分房。住房商品化打破了人们日常生活空间与单位之间的固有联系,以单位为组织的熟人构成的整体化日常生活结构形式走向解体,个体家庭走入陌生人构成的关系松散的社区。日常生活基本单位趋向个体化,人们的日常生活边界意识增强。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打破了农民对土地的固着以及以土地为纽带的宗法血缘关系。保留着“乡土社会”特征的农村在城镇化过程中被逐渐“蚕食”,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日常生活结构因为失去了赖以维系最后土壤而日趋解体,凝结在人们身上的宗法血缘关系纽带伴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动、转移以及土地的流转逐渐松落,“在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中国农村,以家族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文化正在逐渐衰落”^[2]。农村日常生活结构的整体化基础逐渐瓦解。此外,户籍制度的放开、社会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的全社会流动,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可以不断变化,人们与单位、社区、地域、土地之间越来越缺乏固定的联系。联系的不固定性弱化了整体感、集体感,强化了人们的个体存在感,也为人们融入新的日常生活空间增加了难度。

日常生活整体性基础的瓦解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相互之间处于隔离、远离状态,共同的日常交往、日常活动减少。人们常常在不同时间出现于同一日常生活空间而无法产生交集、交流,或者在同一日常生活空间出现的是不可能产生交集、交流的陌生人。无论何种情形,人始终是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个体。

(二)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们在形式上的个体化生存成为可能

人的生存本质上是社会化生存,无法脱离丰富的社会关系。形式上的个体化生存是指人作为个体的“原子化”呈现方式,各种社会关系被隐藏在个体性的活动之中而不易察觉。现代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尤其是网络和移动终端的连接,极大强化了人的个体化存在。

21世纪,电脑、手机、网络开始在我国普及,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电脑、手机由奢侈品变为日常生活用品,由紧俏商品变为大众商品,由服务于科研、实验室变为服务于生活、学习、娱乐、消费……以至于“互联网+”日渐成为网络时代的崭新生活方式。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娱乐等日常活动通过与互联网的连接,成为可以通过非面对面交互即可独自完成的活动。这样,日常活动扩展到了网络空间,人们的一部分日常生活变成隐蔽的领域。在网络化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隐藏在网络空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变为了人与机器(电脑、手机)的联系,人与人的关系被人与物的关系掩盖。个体的日常生活失去了与他人日常生活的现实联系,人在形式上成为了孤立存在的个体。

网络技术通过把个人与他人的直接而现实的联系降至最低,制造出个体化生存的假象,使“宅”在家中的人自以为是一个纯粹的个体存在。由于网络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了“在场”的限制,人成为依靠网络相连的一个个终端的操控者。日常生活没有了在场的交流,整体、集体的感觉、意识也在淡化、消退。

(三) 日常观念领域中人的个性诉求和非理性思维较为突出

21世纪日常生活的个体化的两个主要根源——日常生活根基的个体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个体化——对人的思想观念造成影响。前者导致人的个人意识和个性诉求强烈,后者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非理性化。

日常生活根基的个体化首先导致人的日常生活边界意识走向清晰。由于基于业缘、血缘、地缘关系的共同日常生活空间的失去,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个人的日常生活,并从与他人日常生活的相互交涉中分离出来。尊重并为他人保留“生活空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主体的共识。人们的日常交往更多选择公共空间而更少选择私人空间,邻居间的串门聊天相对减少,共同的日常活动也大幅减少。

日常生活的个体化在观念领域也体现为对个性的追求。个体性对应特殊性,最能体现日常生活个体化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个性,即在日常生活中展现个人独特的兴趣、爱好和审美。可以发现,现代人越来越不满足于标准化、格式化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在家居环境的设计和装修、穿着打扮(cosplay、汉服、发型)、语言文字的使用、日常活动方式等方面都体现出独特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对“传统”的突破。与众不同、打破常规的求新、求异观念蕴含着推动事物发展的因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促进日常生活个体化的同时,也使日常交往、日常信息、日常时间、日常空间碎片化,日常生活时常处于不连贯的断续状态。反映在意识领域,人的思维缺乏连续性,逻辑性受到影响,更多地呈现出非逻辑的特点。在一个碎片化、非逻辑的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失去了对语言文字进行修饰的雅兴,表达趋向直白、直接。此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习惯接收以图片、音像等感性形式传播的信息,感性形象思维增强,理性思辨能力有所下降。这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受到不实信息的蛊惑和欺骗。

21世纪以来,人们发现,日常生活越来越成为自己(个人)的日常生活,人越来越处于碎片化的生存状态,人们在获得自由、施展个性的同时,也莫名地产生了孤独感、焦躁感。渴望和追求个性的个人即便尊重他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也难以达成共识,日常生活丰富性有余而凝聚力不足。如何在个体化趋势已不可避免的时代为人们构建适度的共同的日常生活,在个性与归属感、丰富性与凝聚力之间实现平衡,是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重要使命。

四、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难题

整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各具特点的发展阶段,但是不同阶段之间并非简单的更迭关系。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日常生活的变化并不完全同步,以至于不同阶段日常生活模式共存;由于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历史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的道德观念并存,日常生活观念存在差异甚至冲突。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就是要“以某种伦理理论(价值观念)为指导对日常生活进行改造,使该种价值理念融汇在日常生活之中,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习惯”^[7]。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道德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然而,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使我国当前的日常生活伦理构建面临一定的难题。

(一) 日趋个体化的日常生活组织结构不适应社会主义道德的日常生活基础

任何意识形态都有其对应的生活基础,生活基础夯实了,意识形态方能扎根于其上。因此,任何在意识形态推动下的社会变革都必然要以改造日常生活基础为重任。改革开放以前,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确立以及日常生活基层组织结构的整体化,提供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相适应的日常生活基础。日常生活的个体化折射的恰恰是现代社会人们“共同生活”的缺乏,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道德在日常生活中的根基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追求。我国日常生活的个体化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都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构成了强烈冲击。对于“为人民服务”而言,人在趋于个体化生存的过程中,权利意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逐渐抬头,这在客观上需要社会性的制约,或者说以社会性进行平衡。然而,共同日常生活的缺席、现实社会关系的隐蔽,使人们只看到“我”的存在,只关注“我”的利益,人由社会性而来的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义务被忽略。对于“集体主义”而言,个体化的日常生活使人们缺乏根本利益一致的现实的有机联合体:一方面,居住的个体化(住所的分散)使集体组织失去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和影响能力,另一方面,新的基层组织(如社区、街道)又未能将利益相关的“原子化”的个体凝聚为利益共同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了不受拘束、我行我素的自由生活。

共同生活的基础越是牢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就越能得到保障。在当前日常生活深刻变革的情况下,如何构建、构建何种形式的共同生活基础,从而将个体化的日常生活主体凝聚在一起,是我国当前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必须面对的难题。

(二) 不均衡发展的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统一性要求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然而这种发展因为地区、城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导致日常生活的发展不均衡,也就是说,虽然日常生活的发展趋势一致,但是步伐有快有慢,呈现出阶段上、程度上的参差不齐,不同阶段、不同样态的日常生活并存。以社会主义道德为指导对日常生活进行伦理构建,必然需要针对日常生活的差异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东、中、西部地区的日常生活处于阶梯发展状态。东部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化进程较早、程度更深,先进科学技术(如网络)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更早、更为普及。因此它们较早摆脱了整体化的日常生活组织结构,日常生活的个体化步伐迈得较快,与个体化的日常生活对应的权利、自由、个性等日常生活观念更为强烈,日常生活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传统的力量依然强大,以致日常生活更趋保守,日常生活的整体化程度依然较高,以承载着传统道德观念的共同生活为基础所维系的日常生活也更加保留着传统的痕迹,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各种意识和观念相对较为薄弱。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使城乡日常生活始终存在差距。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基本都以不同形式实现了日常生活的整体化,但是城乡日常生活的生活方式以及日常生活观念等方面一直存在差异。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市场化步伐的加速、交通的发展、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城市日常生活向个体化方向不断前行;然而农村日常生活的变化却一度缓慢,深深扎根于农业文明中的宗法血缘关系成为农村日常生活个体化过程中的强大阻力,直至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交通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使城乡的互动交流日益频繁,给农村日常生活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日常生活发展不平衡在地区、城乡的叠加也表现为处于不同地区的农村与农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日常生活发展的不平衡。无论是何种不平衡,一般来说,都表现为现代日常生活与传统日常生活、现代日常生活方式与传统日常生活方式、现代日常观念与传统日常观念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实质是人们所习惯于追求及固守的道德理念、价值观念的差异。它一方面造成了人们对于他人日常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日常交往中的隔阂和矛盾,另一方面也使构建社会主义道德的日常生活根基面对来自现代和传统两个不同方向的问题。面对现代个体化的日常生活,其伦理构建重在重建日常生活的整体性,为社会主义道德在日常生活的扎根提供条件;重建日常观念的价值统一性,为开放的日常生活提供价值指导;重建日常活动的规范性,为人们自由的日常活动提供伦理规约。面对传统日常生活,其伦理构建重在尊重其日常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将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要求融汇到日常生活之中。

(三) 日常生活伦理观念的多样性与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价值导向的矛盾

从纵向的历史维度: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道德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表现为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即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决定新道德的形成,但是旧道德并不会随之烟消云散,而是逐渐沉淀为传统,经久不去。道德也具有超前性,能够超越现有社会经济关系,预见未来道德发展前景。就我国而言,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短暂时间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发生里程碑式的跨越,日常生活中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伦理观念共存在所难免。从横向的现实维度:日常生活的开放使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的伦理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共存,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念与资本主义的伦理观念、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都在不同范围内存在。这是当前我国日常生活领域价值观念多样性的特殊表现。

但是,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必须超越日常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实现主流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导性,即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主导下的多样化的日常价值观念体系,既保证日常价值观念的正确方向,又保证日常价值观念的丰富多彩。多样化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相互交织虽然增大了发生价值冲突的风险,也增加了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复杂性,尤其是随着网络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动领域,以网络为阵地展开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社会思潮的传播以及价值领域的争论日益激烈,但是另一方面,多样性使日常生活更为丰富多彩,更加具有活力,多种日常伦理观念的碰撞也极易激发日常生活主体的思考,使其由“自在的”存在变为“自为的”存在,推动日常生活的伦理变革和发展。因此,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决不当建立在消灭日常生活伦理观念的多样性基础之上,而是应当在充分尊重多样性基础之上,加强社会主义道德的价

值导向,使社会主义道德基本理念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的价值共识。

因此,我国当下日常生活伦理构建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达成价值共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道德对日常生活的价值主导。多种价值观念的和谐共存,有赖于它们在某些核心价值上具有共同性、一致性,而非核心的价值上保持各自的特点,并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也就是说,共存的价值观念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对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核,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们在国家、社会、公民层面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们应当具有的基本价值共识。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展现社会主义道德的科学性、先进性,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之深深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常识、习惯,形成对日常生活伦理构建强有力的价值引领。如此,不仅可以保证日常生活正确的价值方向,而且可以保持日常生活应有的活力和适度的张力,为日常生活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日常生活的变迁源自七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关系、社会结构、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及发展。总体而言,这一变化的过程是整体性被打破、个体性逐渐生成的过程,反映在日常观念领域就是功利意识、个体意识、自由权利观念的增强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冲击。如何在变化的日常生活中构建社会主义道德的统一性基础、夯实社会主义道德的日常生活根基,是我国当前进行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 仅就社会常态下的日常生活而言,特殊时期如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除外。严格意义上,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也是非常态的日常生活。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M]//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6.
- [2]胡潇.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94,280.
- [3]赵司空.对新中国前三十年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思考——兼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0):42-47.
- [4]鲁芳.日常生活变革及其伦理图式演化[J].伦理学研究,2018(5):130-134.
- [5]李友梅.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253.
- [6]王永江.论个人生活消费全面商品化[J].经济问题探索,1989(2):8-12.
- [7]鲁芳,李唯彤.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本质特点、发生依据、根本任务[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20-125.

The Change of Everyday Lif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Its Ethical Construction

LU Fang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ciet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ings changes in everyday life.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organization of grassroots production units and their high coincidence with living units make daily life appear integral and the thinking of class struggle makes daily life excessively political.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has gradually enhanced the utilitarian appeal in everyday life, and the stimulation of reform to individual vitality makes people's suppressed individuality begin to ris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because the unity of the 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 is broken down, a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kes it possible for people to individualize their existence in form, the tendency to individualize everyday life is further reinforced. In this process, the increasingly individualiz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 weaken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ist morality in everyday life,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unity of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everyday life, and that between the diversity of the ethics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everyday life, bring difficulties to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everyday life.

Key words: the new China, everyday life, change, ethic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文建)